

# 当代美国拉美裔小说中的华人抗争者形象

唐书哲

(中国矿业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 当代美国拉美裔小说塑造了华人抗争者形象。加西亚的《猿猴之猎》通过互文性、文本与“副文本”和“潜文本”的互动,以及对“雌雄同体”概念的文学化利用,塑造了敢于反抗种族压迫和性别歧视的华人抗争者形象。迪亚斯的《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以“讲述”和“呈现”相结合的方式,塑造了善良正直、勇于匡扶正义的华人抗争者形象。华人抗争者形象凸显拉美华人正直勇敢的精神品质,既折射了华人在特定历史时期拉美国家的生存经验和华人形象的多样性,又解构了美国白人文学中被动顺从华人刻板形象,对于建构正义勇敢的正面华人形象和国家形象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关键词:** 美国拉美裔小说;《猿猴之猎》;《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华人形象;抗争者

中图分类号: I106.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38(2024)08-0086-04

DOI:10.13971/j.cnki.cn23-1435/c.2024.08.028

## Image of Overseas Chinese as Fighter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Latino Fiction

TANG Shu-z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age of overseas Chinese as fighters in Garcia's *Monkey Hunting* and Diaz's *The Brief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 through the bifocal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literary studies. Garcia and Diaz blend historical facts with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and depict overseas Chinese as fighters against racial oppression,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power violence. In *Monkey Hunting*, Garcia depicts Cuban Chinese who rise against racial oppression and gender discrimination through intertextuality, the combination of text with paratext and subtext, and the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androgyny". In *The Brief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 Diaz portrays kind and upright Dominican Chinese fighting against power abuse by combining "telling" with "showing". The image of overseas Chinese as fighters can subvert the stereotyped images of Chinese, offer insights into the experience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Latino countrie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ositive Chinese and China images.

**Key words:** Latino American fiction; *Monkey Hunting*; *The Brief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 image of overseas Chinese; fighter

美国文学中的华人形象一直为学界所关注,但相关研究主要探讨美国白人文学中的华人“他者”形象,对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中的华人形象研究不多。<sup>[1]38</sup>作为再现少数族裔在美国生存经历和体验的文学作品,美国少数族裔文学尤为关注种族问题,不少作品再现了华人和其他少数族群的互动,塑造了多元立体的华人形象,其中不乏华人抗争者形象。本文以两部当代美国拉美裔小说——克里斯蒂娜·加西亚(Christina Garcia)的《猿猴之猎》(*Monkey Hunting*, 2003)和朱诺·迪亚斯(Junot Diaz)的《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The Brief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 2007)为例,探析当代美国拉美裔小说中的华人抗争者形象。这两部小说

塑造了善良正直并勇于反抗种族和性别压迫、匡扶正义的华人抗争者形象。这一形象既有助于我们了解华人在拉美国家的生存经验,又能够解构白人对华人被动顺从的刻板印象,为建构正面的华人和中国形象提供借鉴。

### 一、反抗种族压迫的华人抗争者形象

加西亚的《猿猴之猎》塑造了勇于反抗种族压迫的古巴华人抗争者形象。加西亚1958年出生于古巴首都哈瓦那,两岁时移民美国,先后在巴纳德学院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做过记者,1990年后从事文学创作,1992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代表作有《梦系古巴》(*Dreaming in Cuba*, 1992)、《阿奎罗姐妹》(*The Aguero*

收稿日期: 2024-03-12

作者简介: 唐书哲(1985-),男,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英语教学研究。

基金项目: 2023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中的华人形象研究(2023SJYB1069)

Sisters, 1997)、《古巴之王》(King of Cuba, 2013)、《猿猴之猎》等。《猿猴之猎》讲述了古巴华裔陈潘一家在中国、古巴、美国等地的生存经历,作家在契约华工和古巴革命的政治历史语境下,通过陈潘在种植园的抗争和参与古巴革命的经历,以文史结合的方式塑造了他勇于反抗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抗争者形象。

小说第一部分的时间背景为1857年,讲述了陈潘以契约华工身份从厦门被贩卖到哈瓦那的经历。据史料记载,西班牙于1847年运送了首批约800名契约华工到古巴,1851到1875年间是契约华工赴古巴的高潮,约有135,000人被运送到古巴。<sup>[2]174</sup>作家在殖民时期古巴契约华工的历史语境中讲述陈攀对抗种族歧视的经历,塑造他抗争者的形象。陈潘高大强壮、坚强粗犷、敢于冒险,他胳膊上肌肉紧绷,脊背又长又直,希望像飞将军李广那样勇敢地征战和生活。<sup>[3]7-10</sup>作者强调陈潘的力量和体格,和英美白人文学中以陈查理(Charlie Chan)为代表的“矮胖去势”的华人形象形成了反差。在甘蔗园,陈潘与人友善,他无视种族差异,教非洲奴隶中国健身运动。面对白人监工的歧视和压迫,陈潘没有听天由命,默默忍受,而是奋起抗争。他的反抗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受陈潘的影响,一名叫刁牧的华工也成功逃离,为华人赢得了更多的尊重,“种植园的每个人都因为刁牧而对华人高看一眼,自他逃亡后,人们对中国人更加尊重了”。<sup>[3]38</sup>

加西亚还通过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来塑造陈潘的抗争者形象。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将“互文性”定义为将一个或多个表意系统转置于另一个表意系统中,认为每个文本的意义都产生于该文本和其他文本的相互作用中,体现在语言、文化等多个方面,文学的创造者通过表意系统的转置而超越自己的身份,形成了新的多元主体。<sup>[4]111</sup>根据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表意的过程之中”,通过自由联想重构多重意义。<sup>[5]217</sup>《猿猴之猎》主要通过语言和文化转置来实现互文性,加西亚在创作中“阅读了关于中国和古巴那个时期的大量资料,还有中国诗歌及其翻译资料”,<sup>[6]159</sup>在题记中引用了《西游记》的“老孙的火眼金睛,但见面,就认得真假善恶”,在正文中借用李广的典故,让中国文化置于小说的表意系统中,读者会在阅读中通过文本和文化间的“对话”来解读作品意义,将陈攀与孙悟空和李广联系起来,理解他们所共有的抗争精神。

小说第五章《幸运小店》(“The Lucky Fino”)以1867-1868年的哈瓦那为背景,讲述了陈潘在哈瓦那经营古玩店,娶妻生子,参加古巴独立战争的经历。加西亚将该章的时空背景置于章节标题下,以“副文本”(paratext)的形式指涉了古巴独立战争,将人物的经历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通过文学与历史的互动来塑造人物形象。热奈特(G rard Genette)指出“副文本”是指“存在于文学作品的正文周围,调节作者和读者关系的材料”,包括出版商的内文本、作者名、标题、题记等十三个类型。按照它们与文本的关联程度,“副文本”又可以分为“内副文本”(Peritext)和“外副文本”(Epitext),前者指和文本本身相关的一切,如标题等,后者指独立于文

本本身的材料,如文本的封面图画、文本后的访谈等。<sup>[7]1-5</sup>“副文本”引导、影响甚至控制读者对作品的认知和接受,也是作者经营文本的策略和读者理解文本的切入点。<sup>[8]85</sup>《猿猴之猎》中,作家主要借助题记、标题等“内副文本”来指涉古巴解放战争,架构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和陈潘参加战争的文本叙述形成互动,塑造了陈潘的抗争精神,再现了华人为古巴独立而做出的巨大贡献。

陈潘“穿着白色亚麻西装,戴着巴拿马帽子”,摸摸帽檐来回敬那些种族主义者,他不顾妻子反对,参加了古巴解放战争。<sup>[3]66</sup>1867年古巴解放战争爆发,70余名主张独立的克里奥尔地主和资产阶级分子在古巴东方省(现奥尔金省)秘密集会,商讨独立事宜,决定于1868年发动战事。史料记载,古巴华人积极参与解放战争,他们和古巴人、黑人、克里奥尔人并肩作战,为古巴独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还有不少人升任军官。<sup>[9]32-36</sup>加西亚结合这一历史事实来塑造陈潘抗争者的形象,“在[革命]第十一日,陈潘把幸运小店交给卢克莱西亚打理,大步向街道走去,买了50把弯刀,雇了一辆双驾马车和车夫,不顾妻子反对,向东走去,加入了战争,将弯刀交给了指挥官谢安”。<sup>[3]78</sup>陈潘后来回想起华人为古巴独立而做出的贡献,“数千名华人曾为这个国家的独立而苦战,在十年战争中,他们拿起砍刀,在加西亚、阿郎戈等伟大领袖的领导下勇敢作战”。<sup>[3]78</sup>

古巴独立战争于1868年10月10日在东方省亚拉小镇附近的一个种植园打响,而陈潘则于11日向东出发去参战。华人少校谢安曾率领548人打败了西班牙将军普埃约(Pu-eyo)的2125人纵队,阿郎戈(Napoleon Arango)、加西亚(Calixto Garcia)也都是古巴独立战争中的著名将领,其麾下分别有400名和200名华人。<sup>[10]229</sup>加西亚以“副文本”的形式呈现政治历史语境,通过“潜文本”表达自己支持古巴革命的政治立场。“潜文本”指向文本的言外之意和深层意义,隐含了作者的态度和价值取向。<sup>[11]77</sup>文本是作家对小说人物、思想、观念、行为的“忠实”记录,而“潜文本则是作者观念与态度的曲折表达”。<sup>[12]62</sup>作家以文史互照的手法塑造陈潘勇于抗争的性格特征的同时,从侧面指出了华人在古巴解放战争中的贡献,间接表明了自己对革命的支持。除了勇于抗争这一最为明显的性格特征,作家还塑造了陈潘善良重情的品质。他对妻子卢克莱西亚的私生子维克多关爱有加,他忠于妻子,妻子亡故后一直保持着对她的感情。

加西亚塑造的华人抗争者形象能够和外国文学作品中已有的华人形象进行巴赫金式的“对话”。人们也会将其和英美白人文学中的华人形象进行对比,反思并解构英美白人文学中的华人形象。作家跳出英美白人文学中华人“他者”形象的传统,塑造了勇于抗争的华人形象,既挑战了人们对契约华工逆来顺受的认知,<sup>[13]78</sup>又解构了白人眼中被动顺从的华人刻板形象。金惠经(Elaine H. Kim)将美国白人文学中的华人形象归纳为矮胖去势的华人、嗜血的东方人、无助的异教徒三类,分别以陈查理、傅满洲(Dr. Fu Manchu)、阿辛(Ah Sin)为代表。<sup>[14]33</sup>这些负面的华人男性形象体现了西方对中国的东方主义式想象,投射了西方对东方的恐惧。加西亚笔下以陈攀为代表的华人既不邪恶嗜血,也不对唯唯诺诺,而是充满了勇气和生命力,敢于向命运和种族

压迫抗争。

## 二、反抗性别歧视的华人抗争者形象

加西亚从种族和性别两个角度塑造古巴华人的抗争者形象。陈潘的抗争对象主要是种族压迫,陈攀的孙女陈芳的主要抗争对象则是性别歧视。就女性经验书写而言,《猿猴之猎》承袭了女性文学创作中的女性主义传统,再现了雌雄同体( androgyny)式的人物以性别操演为手段对父权制文化的抗争。小说中,陈芳以性别操演对抗性别歧视,拓展了自己作为性别“他者”的生存空间,丰富了生命体验。

在讲述陈芳的经历时,小说的背景切换到了1924年的上海,并在叙述中提到了当时的习俗和服饰,以“副文本”和“潜文本”的形式建构了文本中人物生活的社会文化语境。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 1989)和邝丽莎(Lisa See)的《上海女孩》(*Shanghai Girls*, 2009)等女性主义小说也都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背景,再现这一中国现代化先驱城市中女性的觉醒和她们与性别歧视的抗争。陈芳在中国长大,她与两个姐姐和妈妈靠父亲洛伦佐·陈从古巴寄来的钱生活。陈芳从小就面临着旧社会父权制文化的压迫,出生时遭到母亲嫌弃。为了欺瞒洛伦佐·陈,让他及时汇钱,陈芳的母亲一直把他当男孩对待:“母亲把我装扮成男孩,也像男孩一样对我,没多久,似乎每个人都忘记我是个女孩了。她没给我裹脚,允许我和粗野的男孩们去田野抓蜜蜂。我不在厨房帮忙,也没学会女工。姐妹中只有我一人上了学。为了教育他的‘长子’,他额外多寄了些钱”。<sup>[3]90</sup>在寄宿学校,陈芳把头发剪短,装出粗鲁的样子,不惧和男生打架。后来被迫嫁为人妇的陈芳也拒绝扮演传统妻子的角色,产下一子后回到母校教书。在回顾一生的历程时,陈芳表达了对传统女性角色的抵触和反抗:“我拒绝按照男人的命令生活,因此我的生活就像牛背上的鸡蛋一样不稳定”。<sup>[3]226</sup>

加西亚笔下的陈芳是个典型的雌雄同体人物。“雌雄同体”源自希腊语,原指自然界某些生物兼具雌雄两性,经过伍尔夫(Virginia Woolf)等人的理论化,该词也用来表示一种消除了性别的等级化和社会化认知,男女两种主体性和意识和谐共处的一种状态。伍尔夫如是阐发自己雌雄同体的观念:“我们每个人都受两种力量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如果你是男人,头脑中女性的一面应当发挥作用;如果你是女人,也应与头脑中男性的一面交流。科勒律治说,睿智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sup>[15]85</sup>小说中,陈芳跨越社会文化建构的性别边界,体验了男女两个性别的生活经验,她生为女儿身并结婚生子,但她同时又挑战性别的社会文化规约,踏入男性领域,经历了男性体验,并化解了她“作为本质确立自我的主体的基本要求与将她构成非本质的处境的要求”之间的冲突,<sup>[16]24</sup>塑造了自己独立的、超越性别对立的主体。以雌雄同体的方式消除两性之间的边界,解构性别歧视的生理和文化根基是女性作家常用的手法。在《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1976)中,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就改写木兰从军的故事,塑造了雌雄同体的女勇士形象,她异装为男性,带领部队作战并诞下婴儿,有着双重性别经历和体验。

陈芳的经历也表明了性别边界的建构性和性别的操演性。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性别是建构与操演的结果:“性别不应该被解释为一种稳定的身份,或是产生各种行动的一个能动的场域;相反地,性别是在时间的过程中建立的一种脆弱的身份,通过风格/程式化的重复行动在一个表面的空间里建制”。<sup>[17]9</sup>陈芳的经历表明了性别边界的建构性和可跨越性,她正是利用人们对性别角色的认知来跨越性别边界,打破性别角色的束缚。胡克斯(Bell Hooks)指出,“越界或离开自己的位置需要跨越种族、性别和阶级宰制所设立的压迫性的边界”,“一个人只有逾越,‘离开’‘他/她的位置’,才能够体验,乃至享受各种不同的乐趣”。<sup>[18]145</sup>陈芳向传统女性角色挑战,通过性别操演逾越了压迫性的性别边界。

陈芳作为女性抗争者的形象也和白人文学中的华人女性形象有所不同。在白人文学中,华人女性往往被塑造为性欲旺盛的“龙女”或较小无助,等待白人拯救的弱女子,投射了白人对东方女性情欲化的形象。<sup>[14]17</sup>在加西亚笔下,陈芳既没有臣服于白人男性的魅力,也没有默默忍受男权压迫,而是以性别操演的方式超越社会对性别的管控和操纵,挑战通过制造和维持性别边界让身体物质化、固定化的过程,建构了自己超越性别对立的雌雄同体式主体。

## 三、匡扶社会正义的华人抗争者形象

当代美国拉美裔文学还塑造了匡扶社会正义的多米尼加华人抗争者形象。当代美国多米尼加裔作家迪亚斯《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塑造了正直善良、除暴安良的华人形象。迪亚斯1968年出生于多米尼加首都圣多明各,六岁时和家人移民美国,在新泽西州的多米尼加社区长大,先后在罗格斯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现任麻省理工学院创意写作教授和美国国家图书奖评委,出版有《沉溺》(*Drown*, 1996)、《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你就这样失去了她》(*This Is How You Lose Her*, 2012)等作品。《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获2007年美国书评家协会奖和2008年普利策奖。小说围绕奥斯卡妈妈贝莉的经历,通过外貌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塑造了华人若泽的抗争者形象。他正直勇敢,反抗不公,不顾个人安危为受到迫害的贝莉提供庇护,并将她从枪口下解救出来。

小说将华人若泽的经历放入叙事主线,以“讲述”(telling)和“呈现”(showing)相结合的方式塑造了他正直善良、勇于匡扶正义的形象。作家先用概括性的语言讲述若泽坚强正直、粗犷勇敢的性格特征,然后通过具体事件和言行呈现他的上述特征。这一人物形象塑造方式将抽象和具象相结合,能够使叙事以合乎审美的节奏展开,多元立体地呈现人物形象。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和沃伦(Robert Penn Warren)指出,小说作者需要根据目的、篇幅、结构等要素选用人物塑造方式,但多采用“讲述”和“呈现”相结合的方式来保持小说的总体性,增强戏剧生动性,激发读者的想象力。<sup>[19]161</sup>

迪亚斯如是“讲述”若泽的形象:“迷一般的若泽,始终守护着餐馆,顶着所有飓风般的威胁;又酷又凶的若泽,在三十年代的军阀混战中失去了老婆孩子;若泽,无情而残忍地

保护着餐馆和楼上的房间。若泽悲痛已经从他的体内掏走了所有柔情、希望和家常闲话”。<sup>[20]103</sup>作者概括了若泽粗犷坚强的性格特征，粗线条勾勒了他在中多两国的经历，并暗示了他性格形成的外部原因和在多米尼加动荡时局下面临的生存压力，为他的抗争埋下了伏笔。作者接着通过若泽和奥斯卡妈妈贝莉的互动，用语言和行为描写将若泽的形象具象化。若泽寡言少语，面对逃避迫害而来到餐馆求职的贝莉，他只是抬起头简单说了句能挣多少小费要看你自己了。虽然餐馆生意惨淡，善良的若泽还是接受了贝莉，允许她在餐馆以女招待的身份争取小费，为她提供了长达18个月的帮助和庇护。当贝莉被特鲁希略的秘密警察逮捕时，若泽毫不犹豫地解救她，把贝莉从他们手里抢过来，弟弟沈胡安也双手攥着砍刀。警察向若泽发出了威胁，但他站在贝莉一边，向暴力抗争。“若泽扣动扳机，恐怖的巨响，仿佛肋骨折断了。他的面孔扭曲起来，闪烁出他早已丧失的一切。快跑，贝莉！他喊道”。<sup>[20]137</sup>后来和女儿洛拉讲述自己的经历时，贝莉无不感激地说：“是这些中国人，后来她告诉女儿，救了我的命”。<sup>[20]138</sup>人物的无意识行为最能揭示其性格特征。<sup>[20]135</sup>目击贝莉被捕后，若泽不假思索就挺身而出，向暴力和不公抗争，表现了他的勇敢正直。

像加西亚一样，迪亚斯也把人物形象塑造放在特定的政治历史语境中。李保杰指出，“独裁、暴力所带来的创伤以及之后的流散是多米尼加裔文学的主旋律，而相当一部分文学作品将特鲁希略独裁作为文学书写的历史背景”。<sup>[21]99</sup>1930年，特鲁希略依靠美国支持发动军事政变，在多米尼加建立了长达31年的独裁统治，屠杀迫害民主进步人士，垄断国家经济，淫掠女性。在《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中，迪亚斯把特鲁希略恐怖统治作为作品的语境，书写普通人物的经历，借此反思殖民主义的余孽和暴力。若泽兄弟的经历也从侧面反映了华人在特鲁希略政权下的遭遇和抗争。受政治影响，若泽兄弟的餐馆生意不景气，他们作为小业主，在国家经济被特鲁希略家族垄断的情况下苦心经营，对特鲁希略独裁统治心怀不满。1959年，多米尼加发生了推翻特鲁希略政权的武装暴动，遭到疯狂反扑，不少青年遭到迫害。这一历史事件在文本中得到了再现。“1959年入侵失败后，一场少壮派策动的密谋被揭穿，全国各地都有青年被拘捕、拷打、杀害。政治，胡安蹬着一张张空空的桌子，啐了一口，政治。若泽没搭腔；他只顾躲在他楼上的房间里擦拭斯密斯·威森手枪”。<sup>[20]109</sup>这一细节以文史互动的形式揭示了特鲁

#### 参考文献：

- [1]唐书哲,姚可欣.《加州名匪穆里埃塔》中的华人“他者”形象分析[J].许昌学院学报,2023(03):38-42.
- [2]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J].历史研究,1963(01):161-179.
- [3]GARCIA C.Monkey Hunting[M].New York: Alfred A.Knopf,2003.
- [4]KRISTEVA J.The Kristeva Reader[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
- [5]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一卷)[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 [6](美)杰西卡·莫菲.克里斯蒂娜·加西亚访谈录[J].当代外国文学研究,2004(04):158-161.
- [7]GENETTE G.Paratexts: Threshold of interpretation[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 [8]邵霞.副文本与翻译研究——从序跋角度窥探小说翻译[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3):85-88,95.

(下转第119页)

希略政权下以若泽兄弟为代表的华人小业主生存的艰辛,以及他们反抗暴政的勇气。李保杰认为,“真正将多米尼加历史和文学书写结合的范例是阿尔瓦雷斯和迪亚斯两位作家”。<sup>[22]450</sup>迪亚斯书写宏大历史中的普通人物,但没有像其他多米尼加作家那样,把政治历史放在作品的核心位置,而是将其作为文本的底色,通过人物的经历和内心冲突再现多米尼加被殖民的历史和特鲁希略的极权统治,并塑造了正直善良、敢于向暴力抗争的华人形象,实现了作品政治性和文学性的统一。

加西亚的《猿猴之猎》和迪亚斯的《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将华人的经历置于古巴和多米尼加特定的政治和历史语境,塑造了不畏种族压迫、性别歧视、权力暴力的华人抗争者形象。这一形象凸显华人的力量、正直、勇气、善良,是英美白人文学中刻板化华人形象的对立面。白人作家在塑造华人形象时往往脱离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静态地聚焦华人的一个或几个特征,用它们来代表整个华人族性,<sup>[23]229</sup>正是通过这种基于“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的符号化建构和同质化、单一化书写,<sup>[24]221-248</sup>华人形象往往被简约为傅满洲、陈查理、阿辛式的刻板化形象,从而掩盖了华人形象的丰富性和多面性。这些负面的华人形象在文学中得到反复书写,形成了强大固化的传统,影响作家对华人形象的塑造。解构白人文学中的华人刻板形象既需要批判“认知暴力”背后“差异话语的内在逻辑”,<sup>[25]23</sup>又要对抗文学中的华人形象书写传统。巴赫金指出,小说有着“语义上的开放性,某种与尚未完成的、仍然发展的(结尾开放的现在)当代现实的活生生的接触”。<sup>[26]17</sup>加西亚和迪亚斯在小说中塑造的华人抗争者形象和英美白人文学中的华人形象形成了对话,能够丰富并重构英美文学中的华人形象传统。

除了《猿猴之猎》和《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其他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作品,如非裔作家赖特(Richard Wright)的游记《颜色幕布》(The Color Curtain,1956)、杜波依斯的小说《黑色火焰三部曲》(The Black Flame Trilogy,1957-1961)、朝鲜裔作家姜镛讷(Younghill Kang)的小说《从东到西》(East Goes West,1997)等都塑造了正面的华人形象。这些“跨学科、跨种族”的作品“至今依然吸引着大量学者”,<sup>[27]55</sup>但其中的华人形象还没有得到充分关注。分析这些作品中的华人形象是重构华人形象传统,“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一个有效路径。

人中尤为流行,老年人则较少使用。例如,“很益阳”意味着“极具益阳地方特色”,“很中国”表示“充满中国特色”,“很雷锋”则指“具有雷锋的做事风格或很像雷锋”,“很大学生”则用来形容“具有明显大学生特色”。这种“很+名词”的表达方式既可以表示赞同,也可以用于讽刺,具体取决于语境。

由此可见,“很”在普通话和汉语方言中都是一个频繁使用的程度副词,它在表达程度、强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 参考文献:

- [1]徐慧.益阳方言语法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240,249.  
 [2]张芬.益阳方言连读变调的优选论分析[D].广州:暨南大学,2015.  
 [3]崔振华.益阳方言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61.  
 [4]曾炜.湖南益阳方言中的几个程度副词[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0(11):80-82.  
 [5]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1957级语言班编.现代汉语虚词例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42.  
 [6]李江帆.对副词“很”用法的新思考[J].黄石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4):44-46.  
 [7]徐睿渊.湖南嘉禾(珠泉)土话声母与声调的文白异读[J].方言,2021(04):394-400.  
 [8]曹志耘.浙江金华汤溪方言的语流音变[J].方言,2022(02):129-136.  
 [9]鲁曼俐.汉语益阳方言的连读变调[D].长沙:湖南大学,2006.  
 [10]王蓉.湖南方言代词内部屈折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4.  
 [11]刘若云,赵新.汉语方言声调屈折的功能[J].方言,2007(03):226-231.

(责任编辑 吴明东)

(上接第89页)

- [9] STATEN C L. The History of Cuba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10]刘叶华.他乡·故乡:拉美华人社会百年演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1]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Prentice Hall, 1988.  
 [12]李公昭.文本与潜文本的对话——重读薇拉·凯瑟《我们的一员》[J].外国文学评论,2007(01):60-67.  
 [13]唐书哲.抗争与“越界”:契约华工历史话语的另一面——以汤亭亭的《中国佬》为例[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01):77-83.  
 [14](美)金惠经.亚裔美国文学:作品及社会背景介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  
 [15](美)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及其他[M].贾辉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6](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I:事实与神话[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7] BUTLER J. Bodies That Matter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18] HOOKS B.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0.  
 [19](美)布鲁克斯,沃伦.小说鉴赏(双语修订第3版)[M].主万,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20](美)朱诺·迪亚斯.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M].吴其尧,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21]李保杰.当代美国拉美裔文学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  
 [22]李保杰.美国西语裔文学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20.  
 [23] FOUCAULT M.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 [M]. New York: Vintage, 1973.  
 [24](美)加亚特里·斯皮瓦克.三位女性的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M]//刘须明,译. 帕特·穆尔·吉尔伯特等.后殖民批评 杨乃乔,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5]李贵蓉.书写他处:亚裔北美文学鼻祖水仙花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6] BAKHTIN M M.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27]谭惠娟,罗良功.美国非裔作家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吴明东)